

NEW TRADITIONALISM

新传统主义
郑家栋 主编

东亚价值与 多元现代性

[美]杜维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传统主义

郑家栋 主编

东亚价值与
多元现代性

[美] 杜维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 / (美) 杜维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

(新传统主义/郑家栋主编)

ISBN 7-5004-2874-X

I. 东… II. 杜… III. 儒家-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359 号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分为上、下两部。

上部原书名为《十年机缘待儒学》，中文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下部“儒家之道”选自 Arvind Sharma 所编 Our Religions 一书，由彭国翔先生翻译。

杜维明，1940年生于昆明，祖籍广东。1961年获台湾东海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博士学位，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助理教授。1971年后任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历史系和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哲学教授。1996年以来，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88年当选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主要著作有：《知行合一：青年时期的王阳明》、《论中庸：儒家宗教性》、《仁与修身》、《道·学·政：儒家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主编有：《三重合弦：儒家理论、工业东亚及韦伯》、《儒家世界透视》、《常青树：做中国人的意义》。

郑家栋 主编

新传统主义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美]列文森 著

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

[美]杜维明 著

当代儒学与中国哲学

刘述先 著

合内外之道

——儒家哲学论

成中英 著

断裂中的传统

——信念与理性之间

郑家栋 著

目 录

上 部

引言	周 勤	(3)
1 汉学、中国学与儒学		(5)
一、国际汉学传统与反汉学的中国学之兴起		(5)
二、中国研究与西方主流学科的关系		(10)
三、现代性中的传统及其现代化的多元取向		(15)
四、文化相对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全球意义		(19)
五、儒家进一步发展的“十年机缘”		(25)
2 儒学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		(33)
一、从凡俗的人文主义走向宗教反思		(33)
二、一元上帝与儒家的宗教性		(36)
三、人的神圣性与人类中心主义		(42)
四、“回到学术去”的自我设限与 知识分子终极关怀		(46)
3 儒家“体知”传统的现代诠释		(56)
一、体证之知的道德意涵		(56)
二、超越西方认识论的体知结构		(58)
三、体知在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中的意义		(61)
四、体知的实践转化功能		(64)
五、知人的认识论		(66)
4 从亚洲危机谈工业东亚模式		(70)

5 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88)
一、关切政治参与社会，公众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通识教育	(88)
二、文化可分两大定义，也可以是一种“添加价值”	(90)
三、学习语言学习文化，才能了解民族的精神面貌	(91)
四、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儒学创新	(92)
五、传统和现代是你侬我侬，而不是绝然分割的两极	(94)
六、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宗教	(96)
七、地域性与全球化：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生根	(98)
八、重新了解自然，人心和天道的合一合德.....	(100)
九、人类共存的两大基本原则与儒家伦理.....	(101)

下 部

6 何为儒家之道？	(119)
一、界定儒家的精神性.....	(119)
二、儒家传统的形成.....	(126)
三、儒家之道的第一期.....	(135)
四、儒家之道的第二期.....	(150)
五、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的核心价值.....	(167)
六、儒家精神方向的几个显著特征.....	(186)
七、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家庭的动力.....	(196)
八、儒家之道的第三期.....	(206)

上部

引　　言

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何在？笔者近年来因在哈佛求学之便，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时有交谈。杜先生认为：目前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个“十年机缘”。十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在人类历史中稍纵即逝，但这个儒学发展机缘已呼之欲出，就看我们能不能抓得住。

这将是跨越世界的十年！

一个世纪以来，儒学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消长。在本世纪初“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儒学从两千年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席上游离出来，徘徊于少数与五四文化精英具有同等历史担待的学人之笔端。与五四时期主流知识分子决裂于传统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是，这一数十年以后才被人们认为“当代新儒家”的文化思潮，在其造端者那里就毫不含混地将中国文化现代再生的契机直指“晚周之遗轨”（熊十力语），直指孔子所奠定的儒家传统。几十年来，这一思潮以学统的形式一系相承，不绝如缕，并在空间上呈现由中国本土向港台的飘移。面对本世纪初以来应接不暇的种种现代化理论，20世纪儒学之惨淡经营较之于北宋初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景况远为甚矣。

然而，近三十年来，儒学似乎开始时来运转：从70年代后期出现的有关工业东亚模式的论域，80年代中国大陆新儒学研究列入“国家科研项目”，到90年代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和回归传统，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等对儒家传统价值的普遍

认同，西方汉学以外的思想学术领域对儒学思想体系的日益关注。在空间推移上则从港、台到东亚，从东亚经由太平洋走向全球。然而，面对这三十年来儒学在时空上不断延伸与拓展的历史进程，儒学的命运这一 20 世纪初即被严峻地提出的问题也许变得空前严峻了。已有这样耸人听闻的“预言”：走向全球的儒学可能正标志着它真正的寿终正寝。

这同时也将是跨越千纪（millenium）的十年！

如果说公元前一千纪人类创造了轴心时代，各轴心文明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奠定了世界文明的多元基调，则历经了两千年的文化碰撞与价值冲突，我们能否期待以 2000 年开其端的新千纪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二轴心时代？所不同的是，第一轴心时代的各文明并未意识到与之共时的其他文明的存在，而第二轴心时代能否出现的关键，不仅在于各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而且在于能否使各个文明的独特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基此，择与杜维明先生学术交谈的相关论点结集成册，以期引出进一步讨论。纵观 20 世纪以来儒学的发展，第三代新儒家虽然从理路上接续了宋明心性哲学及 20 世纪第一、二代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但问题意识及其所涉及的论说层面已有很大不同，由此，体现在儒家传统的现代诠释诸方面的走向也相去甚远。如果说当代新儒学的先驱者试图以“返本开新”的直抒胸臆揭示儒家传统在现代进程中的相关性，则他们的后继者旨在以对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拓宽和加深所谓“相关性”本身的内涵。

周 勤

1998 年于美国剑桥

1 汉学、中国学与儒学

一、国际汉学传统与反汉学的中国学之兴起

周：杜先生，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汉学领域的研究动向日益关注，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于1995年创刊，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杂志也正在创刊之中，此外，还有诸多介绍各国汉学研究成果的出版物。汉学研究这一历来十分冷僻的领域得到日益普遍的关注，您对这一现象一定有很多见解。

杜：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汉学研究在欧美已源远流长，从历史悠久的汉学杂志可以窥得几分消息：今天由荷兰和法国汉学界合编的《通报》(*Toung Pao*)早在1890年就开始刊行，已有一百多年的健康寿命。延续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传统的《远东古代文物博物馆馆刊》(*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充分体现瑞典的汉学学风，在1929年即开始发行。作为北美汉学研究主要刊物的《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从1936年至今已出版56期，而且从1977年以来每期包括两册。销行网络宽广的《亚洲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算是后起之秀，但从1956年创刊算起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如果把前身《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9)列入考虑，那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1928年至今没有间断，是中文汉学

研究的权威学报。台北的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所出版的《汉学研究》有很大的信息量，而中心也常为国际学人提供研究资金。在日本，汉学刊物就更多了。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东方学报》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东洋文化》代表两个高水平的日本汉学传统。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和欧美汉学界的关系很密切，《清华学报》和《燕京学报》影响极大，中研院的史语所和重点大学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中国大陆重新建立与国际汉学界的沟通。在这样一个历史前提下，很有必要发展一本我们自己的国际性汉学杂志，它既有承继性，也有合作对象，更有前瞻的视野。《世界汉学》在这个意义上是第一次主动自觉地从中国这一汉学的母国发出一个广结善缘的信息，以汉语的方式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桥梁，从沟通信息开始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周：汉学作为一门发展悠久的学科，其内涵、价值，以及方法学方面的取径是什么？

杜：“汉学”(Sinology)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名词，从词义上说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研究很不同，其内涵和埃及学(Egyptology)相近，重点在研究世界上业已消失了的文化，并力图恢复其历史原貌。所以传统汉学是一门深入细致、专业性很强且又十分冷僻的学问，所需基本功难度极大，不但要掌握考古（如敦煌佛教变文的发现和甲骨文出土等都是汉学界的大事情）方面的原始资料，而且语言的要求很高，除了古代汉语外，还要掌握多种极难解读的语言，如蒙文、满文、藏文、西夏文、鲜卑文等。从事这种研究的西方人士，或者本身出自贵族家庭，没有经济考虑，投毕生精力精雕细琢；或者靠政府或大基金会长期资助。它不求速效，完全没有现实性，不问家国天下事，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正因为它冷僻、难度高，所以参与者极少。以前有一位哈佛博士生到巴黎大学去听世界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éro)的演讲，马伯乐如雷

贯耳的名声使他半小时前就去占位子，结果只有四五位老太太来听。这样冷僻的学问是不可能为大众弘法的，因为它无法与一般人沟通，而且沟通本身也不是它的意愿，它只是探寻一种业已消失了的历史陈迹，并相信能够以最严谨的方式重现。这与国内目前的国学热有很大距离。

周：这一类汉学家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之间有没有沟通？

杜：几乎没有。传统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很少到中国，他们大多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做研究，一般完全不能用中文交谈。如美国加州柏克莱业已故去的汉学家谢弗（Edward H. Schafer），中美建交后有人建议他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他说我的中国就在我的书房里。国内学者来和他谈学术，他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因为彼此关切的课题差距太大。另一位柏克莱汉学家布伯格（Peter Boodberg），通十多种语言，古代汉语尤其精到。他视汉学研究为其生命，每天谈论的只有汉学，其虔诚和专注现在已不多见。前苏联汉学家鲁彬（Vitzly Rubin），父亲是苏联科学院语言学权威，因幼时曾问其父世界上哪一种语言最难懂而又最想学，其父回答是中文，于是他就专攻中文。五十多岁才从燕京大学来剑桥定居的史学家、汉学家洪业（William Hung）先生曾与 Francis Cleaves 每天下午四点钟在燕京喝茶，谈汉学，几十年不中断。他们曾打算用六种语言编一本第一流的中国字典，经过多年努力，积累了很多资料，后来资助机构要他们示范，他们示范了一个“了”字，用了好几年的功夫。全书需要投入的资金、人才、时间是不计其数的，所以没有成功。如果搞成，对学术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在电脑检索没有发明之前，哈佛燕京社曾支持编写重要典籍的引得，由洪业教授主其事。

周：这些汉学家如此沉浸于中国的精致文化，是一种单纯的智性追求还是因为某种猎奇心理？这与古董收藏家或鉴赏家有什么不同？

杜：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说这些汉学家热爱中国文化当然对，但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奇特而冷僻的智性追求，尤其是对“异质”文化的兴趣。这有点像福柯(M. Foucault)所引的比喻——“中国百科全书”(Chinese Encyclopedia)，意即中国文化中所有的范畴、方法、结构等与西方都背道而驰，如时空的错乱以及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是不成套的东西的混合交错。对此，这些汉学家的态度是先悬搁理性，而对其文化的细部做精细探究。这有点猎奇心理，因为其研究趣味和价值取决于研究对象与自己文化距离，距离越远兴趣越大，因其和现实毫不相关，吸引力反而特别大。可以说，汉学家的一个原动力是纯粹趣味，确实很像一个古董收藏家，他们认为收藏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贡献。

周：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在西方似乎仍在延续。

杜：当然。以北美为例，除了哈佛大学以外，尚有华盛顿大学(西雅图)、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那些地方的杰出的汉学家，基本功训练极强，研究领域在古代而在现、当代，课题非常冷僻，界定非常严格，方法非常精细，如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训诂、版本、考证等纯粹智性的工作。这些汉学强的地方都有第一流的汉学图书馆，而且有第一流的图书收藏家，如芝加哥的钱存训，哈佛的吴文津等。哈佛燕京社在北美及世界的汉学研究中扮演了积极推动的角色。

周：相比之下，纯粹的汉学研究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反而成为一个明显的阙失面。

杜：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在西方发展的整个汉学研究，中国是缺席了。其实在美国学术界已经与欧洲有了距离。欧洲、前苏联、日本出了不少第一流的汉学家，使得西方学术界一听 Sinology 就肃然起敬。世界上这样的汉学家是屈指可数的，如同古希腊、古埃及的研究者，而且他们之间往往有很深的情谊，因为在那样的学术象牙塔，能够对话的人极少。以前美国

汉学界如哈佛、芝加哥、华盛顿等大学每年只训练一二个人，甚至大学部每年只训练三四个人。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文化研究。

周：这很有趣。中国学者往往比较低估西方汉学的研究水平，因为首先对他们理解典籍的能力就表示怀疑。其实他们中略胜一筹者大有人在。如高本汉从历史语言切入，以文法差异尤其是方言与地域的关系确定《左传》作者非齐鲁人，为中国学者卫聚贤的一个假设提供了有力证据，成为学术界定论。不过，这样一种纯学术的汉学研究有其长处，也很明显有很多限制。

杜：这毫无疑问。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美国出现了另一股中国研究的潮流，就本质而言可说是一种反汉学的中国研究，与前面所说的汉学传统格格不入。这一新的中国研究潮流始于二战中的“敌情研究”，美国在二战时期研究日本，冷战时期研究苏联，朝鲜战争时期研究中国，正是这股潮流使然。日本研究既然始于敌情，起初是为了训练从语言入手破译密码，特别是军事方面密码的人才。当时有一大批有语言天赋的人投入这样的研究，如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支援这类研究的经费来自“国防法案”（National Defense Act），由国防法案通过了六种主要语言（critical languages），中文即其中之一。当时有大批款项拨进学术界以研究中国。这一研究的对象是当代中国，以哈佛为例，扮演相当重要角色的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费正清的东亚研究与哈佛燕京汉学家如 Francis Cleaves（研究蒙古），James High-tower（研究古诗），杨联升（有汉学界的检察官的美称，因为他能对一流汉学家的作品写评论）等是格格不入的。现在有人说费正清是第一流的汉学家，很不适合，在美国汉学界他不仅不是汉学家，而且是努力把汉学转向现代中国研究的关键人物。费正清有两个主要角色，一是使中国研究成为与现实相关的学科，并通过国防预算拨款来进行这一工作；二是强调研究当代中国一定要研究中国现代史，而研究中国现代史一定要研究清史。他本人就